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4.05.004

林译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日常性

黄锦珠

(台湾中正大学 中文系, 台湾 嘉义 90003)

摘要: 从“日常性”的角度,观察林译言情小说中运用古雅的文言,描述言情过程所具备的细节琐事,并试图抉发此类书写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 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言情;日常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4)05-0425-07

Everyday life of “La Traviata Heritage in Paris”, a love novel translated by Lin Shu

Huang Jinzhu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Taiwan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Reg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observe, from the viewpoint of everyday life, how Lin Shu makes use of elegant classical Chinese to describe the details and trivia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falling in love and also to present the modern meaning of such writing style.

Keywords: Linshu; “La Traviata Heritage in Paris”; translated love novel; everyday life; modernity

林译小说不但在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过相当的影响力。林译小说中,言情类占有颇大数量,其成名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便属言情之类,曾获“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1]365}的评赞。林译言情小说不但是引导中国读者一窥西方文学壶奥的重要载体,同时具有引领文坛迈入现代性之功。然而其现代性之意义展现,不仅仅是传递前所未闻的西方文学,或者作品中虚构的异人异事,而是展呈于言情叙事中所描摹的日常细节琐事。正是在这些生活中微末若不足道的日常书写中,当时所追求的现代性才真正落实扎根,成为读者大众得以接受的自然事实。本文意图从“日常性”的角度,观察林译言情小说如何运用古雅的文言,描述言情过程所具备的细节琐事,并试图抉发此类书写的现代意义。由于林译言情小说数量不菲,为了凝聚焦点,以期对小说文本进行深度解读,本文将以《巴黎茶花女遗

事》一书为讨论中心。

一、“外国红楼梦”

林纾翻译小说之始,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均有佳作可见,无论他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文言做为翻译载体,《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问世,不但为翻译文学辟一奇境,也为稍晚的民初言情小说辟一奇境,更为文言写作辟一奇境。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1905)曾经提及:“《茶花女遗事》,今人谓之外国《红楼梦》。”^{[2]172}显示当时读者理解并接受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观点之一,是把它与中国自有的白话章回小说《红楼梦》相比拟。也就是说,文言载体或白话载体并不是读者关注的重点,也无碍于此二作之相似处。两部小说的言情内容,包括人物、情节与悲剧性结局等,可能才是读者共同受吸引的要素。邱炜菱《茶花女遗事》一则曾说:“年来忽获《茶花女遗事》,如饥得食,读之数反,泪盎然凝栏

收稿日期: 2014-08-20

作者简介: 黄锦珠(1959-),女(汉),台湾嘉义人,教授,研究方向:清末民初小说与性别研究。

干。每于高楼独立,昂首四顾,觉情世界铸出情人,而天地无情,偏令好儿女以有情老,独令遗此情根,引起普天下各种情种,不知情生文耶,文生情耶?”^{[2]46}这样的阅读反应,应该很能代表当时读者的心声。从邱炜菱的阅读心得,可以得知男、女主人公的真情至爱以及小说的悲剧性结局,是感动读者的重要因素。情爱之所以能真挚动人,结局之所以能令读者共感抱憾,与林纾译笔“传神绘影,如遇两人于纸上”^{[2]45}当有莫大关系。

从某个角度说,林译小说的文言体,无碍于读者品味《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情感描写,也无碍于读者把它与《红楼梦》联想在一起。不过,中国旧有的文言小说中,未必没有男女相爱悦而后中道分离、未得善果者,唐传奇的爱情故事以悲剧性结局收场者,也所在多有。事实上,清末民初的读者也常会从茶花女其人联想到唐传奇的女主人公,例如陈衍《为林琴南题巴黎茶花女遗事后》就有“夫人汧国定前身”的说法,把茶花女形容成汧国夫人李娃投胎转世。吴东园《法京巴黎茶花女史马克格尼尔行》一诗也说:“诡秘行踪学李娃,缠绵别恨满天涯。”“小玉自知病不起,红颜薄命乃如此。”^{[3]57-58}诗中使用李娃与霍小玉二人物为喻,比拟茶花女的行事作为。由此二诗可见,林译小说中的茶花女,与唐传奇的李娃、霍小玉,不止一次被相提并论。不过小说人物的联想,是一回事,小说整体的书写风貌,是另外一回事。茶花女的妓女身份,使中国读者联想起唐传奇的名妓,如李娃、霍小玉等女性人物,乃是身份、形象使然。至于小说整体的阅读感受,令当时读者联想到的,大部分是白话章回小说,尤其是《红楼梦》。

平子曾说:“圣叹乃一热心愤世流血奇男子也。然余于圣叹有三恨焉”,其中第三件恨事就是:“三恨《红楼梦》、《茶花女》二书,出现太迟,未能得圣叹之批评。”^{[2]85}《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被直接拿来与《红楼梦》相提并论。二作之间的相似性或共通性,虽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是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应不难了然于胸,发会心之一笑。冷血也曾经提到:“读《红楼梦》,一境也;读《水浒传》,一境也。读《西厢》,一境也;读《西游记》,一境也。读《茶花女遗事》,一境也;读《包探案》,一境也。天下之境无尽止,天下之好探亦无尽止。我愿共搜索世界之奇境异境,以与天下好探新境者共领略。我乃采译《世界奇谈》。”^{[2]144}冷血的

说法,很自然的将《巴黎茶花女遗事》摆放在《水浒传》、《红楼梦》等白话小说的脉络中,也把它与白话小说名著等量齐观。由此可以间接印证金松岑的比喻:“《茶花女遗事》,今人谓之外国《红楼梦》。”^{[2]172}此说不是凭空突起,也不仅是个人之见,而是当时不少读者的共同观感。

文言体的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什么这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白话体的《红楼梦》?最显而易见的理由,应该是言情内容:它们都是言情小说,而且以悲剧性结局收场。不过唐传奇名篇中,也不乏言情且以悲剧收场者。所以,应该还有其它更关键性的因素在。邱炜菱的评述或许可以提供些许端倪:“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2]45}其中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文笔极表赞叹之意,“曲曲以赴”、“一时都活”等语,显露出邱氏对于小说描写鲜活逼真的阅读感受。形成这样的阅读感受,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乃是《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内容描述,立足于日常细节、生活琐事者多,与《红楼梦》多叙写生活细节者如出一辙,故而容易引起读者联想。

林纾以文言从事翻译,译笔优雅,不但使西方文学获得中国读者的青睐,也让传统文言获得新的运用与开拓。林译言情小说中,为了展现原作细腻的情感书写,原以简洁精练见长的文言体,往往也必须进行更为具体枝微,甚至繁琐细碎的日常细节描述。胡适就曾经说:“古文不曾作过长篇的小说”,“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4]215}胡适认为林纾运用文言体译写长篇言情小说,是文言写作的一大成绩。其实《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篇幅远比《迦茵小传》少,以商务印书馆的现代版本为据,《巴黎茶花女遗事》正文占82页,《迦茵小传》正文则占248页,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三倍。因中国旧有的文言小说,很少连绵将近百页者,胡适认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属于长篇小说,并不为过。然而古代小说以文言写情,并不罕见,胡适所说的“古文不长于写情”可说是一种笼统说法,其背后的比较基准,应是白话小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实是回顾过去的文言文,并

展望未来的白话文,藉以肯定“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的表现及其成绩的一篇长文。胡适强调文言古文已经是“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4]202}却不抹煞林纾译文的卓越表现,可以说是公允之论。林译小说以文言翻译,而且充分展现小说所需要的言情叙事,其细腻曲折的表现,恐怕是长久以来文言文(包含文言小说)难以达到的成绩。若予以仔细检视,将不难发现,林译小说之所以充分展现细腻曲折的言情叙事者,乃得力于日常化的书写内容。

二、情爱见证：琐碎重复的日常细节

《巴黎茶花女遗事》开篇,透过“小仲马”见到拍卖告示写起,然后写遇见“亚猛”,进而从亚猛口中,得知与“茶花女”“马克”相识、相爱而中道分离,最后马克病逝的经过。亚猛与马克从相识到订情,间隔二年,不过真正相处的时间却极为短暂,短暂的相处过程中,小说藉由琐碎重复的日常细节,一方面塑造亚猛重情重礼的绅士形象,另一方面则建构二人相待的真情挚意。

亚猛第一次见到马克是在街上,深受马克吸引,但并未相见、交谈,亚猛只是远远看着马克的容貌、衣着、举止。第二次是在剧院,亚猛要求友人代为介绍,友人回答:“勾栏中人,乃烦先容乎?”^{[5]16}友人的回答,合乎一般对待风尘女郎的现实,亚猛却坚守对待良家妇女该有的礼节,不愿冒然前往。友人虽果真代为引见,却不止一次提醒亚猛:“君勿钦礼马克如侯爵夫人也。”“君何重视若辈,以尊礼妇人之意加之?彼又乌知君意也!”^{[5]16-17}马克身为妓女,绝大多数男人都会直接接近她,一旦见面,也常常诙谐笑谑以取乐,就像友人所说的:“遇此辈人,可以恣吾谈谈。”^{[5]16}但是亚猛不为所动,始终以敬重有礼的态度对待马克,这是亚猛与众不同之处,展呈了亚猛尊重、敬爱因而以礼待之的品行、格调。故事中,亚猛此举,或许遭友人质疑,甚至遭马克揶揄,但正是友人的质疑与马克的揶揄,反衬出亚猛的忠诚厚道、自敬敬人。其形象之特出,一开始即足以吸引读者的目光。

正式见面之时,亚猛过于拘谨,遭到马克嘲笑,曾因此抛下对马克的爱慕:“而一晌厚视马克之心,至此亦复冰释”。^{[5]16}但是过不了多久,亚猛

见到“马克倩影在灯光中,如接图画。”美丽的情影,很快就扫除了亚猛的不快:“转觉忿怒马克揶揄之心,逐渐为欢爱之心渐推渐远。”^{[5]17}此后两人虽未再正式见面,亚猛爱慕之心已经深植。亚猛倾慕马克,从一开始就比一般男子真诚、深刻,虽然知道马克的妓女身份,却不因此稍有轻慢之心,小说以“天生情种”^{[5]15}诠释亚猛的情感性格,至于性格的落实,则是透过他的实际言行:初识马克之际,亚猛不理会一般人对待妓女的惯态,也不管友人的劝诫,处处以对待良家妇女该有的礼节礼遇马克,虽然受到揶揄,却不改初衷。这样的叙写方式,透过细微的人际礼貌,一方面写出马克必须送往迎来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又展现亚猛的真挚情意。所描述的事务:仅仅是要不要代为介绍、引见这个小细节,虽极其平淡琐碎,恰恰是日常人际关系本来存在的一个小环节。透过这么一个小环节,展露亚猛对待马克不同于他人的一面。亚猛深情有礼,尊重敬爱马克的“情种”形象,因此鲜活动人。这个人际往来的小细节,在此发挥了莫大功用。

后来亚猛听说马克生病,“余初闻,心怔忡不能自己”,“乃每日至马克家问阖者,审马克病状”。^{[5]17}这个每日问病的重复动作,并没有见到马克的面,却暗示了一种只知付出、不问回馈的心意。这是后来马克受到感动,并迅速订情的因素之一。因素之二,则是第二次见面时,亚猛流露出对马克身体健康的真诚关切。

马克因病离开巴黎两年,亚猛在剧院中与她再次相遇,已经不认得,因友人“家实瞳”与马克打招呼,才引起亚猛的关注。当夜有机会造访马克于其家,这是两人第二次正式会面。当夜席上,马克豪饮,不久轻微咳嗽,亚猛观察到她“素巾抹之见血”,马克退入“更衣处”,同席他人不以为意,亚猛则“心骇极,疾趋视之”。亚猛进入更衣处,问候马克,“马克视余,意似喜”,^{[5]23}两人于是在更衣处交谈。这次交谈,亚猛得以向马克表白心意:“情不自禁,发而为此。”^{[5]25}马克不但允诺让亚猛“明夜十一点至十二点两刻”来访,^{[5]27}也很诚恳说明自己的处境,不希望亚猛重蹈前人覆辙:“盖吾一年须费十万佛郎,必非亚猛所堪。”“若为一马克之身,颠倒谬乱,深所不忍。”^{[5]25-26}亚猛因此也感动莫名:“余此时无言,心念马克平日嫚讴狂饮,侈荡无伦,其性情哀恻之深,如自障

十重厚幙,今一夕之谈,全身涌现。余若揭幙而入,抵其肺肝深处,此时竟难寻觅一语以谢马克矣。”^{[5]25}两人密谈订约后,马克“以红茶花一朵,着余衣袂之上”,还交代“君不能以吾言语客也”。^{[5]27}两人情谊,这时候有了具体进展,进展之速,马克也颇有自觉,她告诉亚猛说:“君知我许君之速乎?以我余息不久,旋化异物,故谋此甚促耳。”^{[5]27}马克健康亮起红灯,她颇有自知之明,又因自伤命薄,也不甚爱惜健康。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接受亚猛示爱,除了自认余命不长,主因还是在亚猛所表现出的诚意与真心。

第二次见面之时,马克知道亚猛曾经关切她的病况,“马克曰:‘吾病时闻阁者言,时有一少年时问余病者,即君也耶?’余曰:‘然。’马克曰:‘嗟乎!’”^{[5]21}稍后又再次提及:“马克忽又问余曰:‘问阁者于门外,常以吾病为焦灼者,即是君耶?’余未及答,马克曰:‘此人间至情,吾不知所谢。’”^{[5]22}可见马克对于亚猛言行所代表的情谊相当留神,而且铭感在心。事实上,马克号称“胭脂队长”,^{[5]17}送往迎来,阅人无数,并不像一般妓女那般逢迎客人:“马克接人,恒傲狷落落,不甚为礼”,^{[5]22}而且“言论尖峭,微近轻薄”。^{[5]17}初见亚猛,即揶揄嘲弄,令亚猛难堪。再见亚猛时,又令同时在座的“伯爵”难堪,可以说,她是一位玩世不恭的名妓。小说描述她令亚猛难堪的情状是:“以纤指握葡萄,且啖且顾余。余色赭,不敢正视。马克耳语隔座妇人,笑吃吃不可止。余此时左右无所自容,马克竟置余无一语。”^{[5]16}马克喜欢吃“蜜渍葡萄”^{[5]16},友人买了葡萄后带亚猛去见马克。小说描述马克一边吃葡萄,一边看着亚猛,却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加上耳语、笑声不止等等,都是微细的小动作,但也正是透过这些琐琐碎碎的细节,马克倨傲不恭的情态,得以历历如在目前。吃葡萄,多么平凡无奇!此处透过凡常生活可见的小事小物,成功营造“心比天高,身为下贱”^{[6]86}的名妓形象。“吃葡萄”这件日常琐事,恰恰是用来表现马克身份与性情冲突矛盾的重要媒介。

马克既然是一位玩世不恭的名妓,对于自身所处之现实有充分觉知,对于一般男子把她当玩物看待的心态,也了如指掌。亚猛相见之初,还没机会表露自己的真心,马克视之为一般狎客,乃至令其难堪,实仍在情理之中。然而一旦获知亚猛

真心,她的响应也是真诚无隐。亚猛先有时时问病的行为,后有关健康的当下表现。马克咳血,同席他人视为平常,只有亚猛关切备至,进入更衣处问候马克。小说描述亚猛进入更衣处所见:“案上陈杯水,水面红纹萦带,丝丝均血缕。”^{[5]23}透过水杯沾染、漂浮的血丝,暗示了马克病状。一杯水,这也是日常生活所用的小物事而已,却是马克健康危殆的重要暗示。马克一开始还未察觉、或者也不相信亚猛果真为她担忧:“然见余愁郁,转以余为病。”^{[5]23}后来才确认亚猛真是来关切她的健康:“马克审吾为马克忧,竟至吾前执吾手。余携马克手至唇际,不觉泪滴其上。”^{[5]24}执手、滴泪等小动作,再一次显示、验证了亚猛对待马克的真心诚意。可以简约的说,亚猛与马克第二次相见过所发生的种种,并没有特殊非常的事件,只是妓女接待客人常见的过程,包括谈话、吃饭、饮酒,加上咳嗽、喝水等等日常生活常见的事务,然而透过这些日常事务,恰足以传达并验证亚猛体贴多情、真诚关怀马克的心意,也因而感动了倨傲玩世的马克。

亚猛与马克两人,从相识到订情,期间发生、出现的事物,主要是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常事、琐事,包括:看戏、吃饭、饮酒、接客、谈话等,属于妓女生活的常态,以及吃葡萄、揶揄、咳嗽、喝水等,属于马克个人的生活习性与病中“常有之事”^{[5]23},乃至代为引荐、关切问候等属于人际相处常见的平常礼节、细言微行,透过种种日常性生活事务的描述,成功营造亚猛与马克的人物形象,也逼真描绘两人的情谊互动。这种以日常生活中各种常见常有之事,做为小说主要叙写题材与内容的写作风貌,与《红楼梦》大量叙写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藉日常以写情,尤可说是二作相通的共相,无怪乎晚清读者以“外国红楼梦”称呼《巴黎茶花女遗事》。透过日常性书写,小说所营造的男女情爱,乃奠基於平淡凡常的生活事物之中,其感情表现反而更具信度与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日常生活的描述中,“个人”主体的重要性无形中获得实践与强调。大人物、大事件、大时代的宏大叙述,是传统历史文本、文学文本经常可见的题材,自《史记》建构本纪、世家、列传的人物传记序列以后。帝王、诸侯、名臣、名人不但是历史书写的必然对象,也经常成为文学书写的爱好题材。长篇白话章回,如《三国

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所写，都是“非常”性的人与事，《金瓶梅》与《红楼梦》才将笔触转向“日常”性的饮食情色，《巴黎茶花女遗事》透过日常性书写，藉由现实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摹绘“人间至情”，描述男女间的真情挚爱，形塑亚猛与马克的个性、形象，“正因写实，转成新鲜”，^{[7]234}不但彰显日常事物的艺术效应，也暗示了日常事物的莫大潜能。林纾以文言译写言情小说，处处彰显书写日常生活的艺术效能，使得文言体的应用达到开拓、新创的境地，难怪胡适以不无夸张的形容，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4]215}文言历来为正式文体，使用于大人物、大事件、大场合，乃习以为常。至于以文言写日常末微琐事，又借日常琐事以写情，反而替文言体的应用拓展了新疆域，形构了新风貌。

三、详确的时空刻度与心理进程

《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开始，描述“小仲马”见到拍卖告示，而后参观拍卖物品，不但写出确切的时间、地点，同时也在后续事情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交代翔实明确的时空刻度，即便是描写亚猛面对马克接待别的客人，不自禁的产生妒忌、愤怒、失望种种复杂情绪的心理进程，也大都伴随明白可验的时日、钟点。这些详确的时空记述，不但展示现代化的新时空观，也显现中西不同的生活方式与观念。

小说首先描述“小仲马”所见：“余当一千八百四十年三月十三日，在拉非德，见黄榜署拍卖日期”，“准以十六日十二点至五点止，在恩谈街第九号屋中拍卖。又预计十三、十四二日，可以先往第九号屋中，省识其当意者。”^{[5]3}有关即将拍卖以及事先提供参观的年、月、日、时、地，均记述得明明白白，而且详细准确。拍卖当天，也清楚写出到达时间：“于是余于十六日一点钟，仍至恩谈街。”^{[5]6}其中所述“恩谈街第九号”，即是马克生前居处门号。小说稍后写到马克生前经常往来的邻友“配唐”，也是确实写出配唐所居的门号：“与吾比舍，吾第七号，彼第九号，开窗适面其妆楼。”^{[5]18}假若是中国古典小说，此处很可能只叙述“与吾比舍，开窗适面其妆楼”便足以交代，但《巴黎茶花女遗事》明确写出门牌编号，除了交代配唐住处的明确门号，说明七号与九号毗连相邻以外，同时展露门牌号码的奇、偶分列与精确计

数，与中国民居旧有的标志方式如里、坊、胡同等不同。在阅读过程中，显然提供了更为仔细明确的空间方位，也暗示了西方城市街道、房屋的编制方式。这种仔细明确的地点描述，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不但颇为新鲜，且同时提供有关西方社会，特别是城市、街道、民居的相关讯息，及其异于中国的具体感受。

小说中公元纪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计时方式，也与中国帝王年号纪年、一日十二时辰的传统计时方式不同。二十四小时比十二时辰更为精细准确，每小时又划分为六十分的时间刻度，也远比中国以“刻”为单位的计时方式更为细致。小说不时运用“时”、“分”等明确时间，做为事件进展与人物行动的依傍。例如马克要求配唐前来作伴、解围，以免除伯爵的纠缠，配唐稍微延迟了一下，马克就抱怨：“我迟君十分钟矣。”^{[5]19}“十分钟”原只是很短的时间，因马克不喜欢伯爵在旁，“十分钟”也变成令人无奈的漫长时光，马克对伯爵厌恶之深，由此可知。配唐带着亚猛，家实瞠一同进入马克住处，当马克获知亚猛经常向守门者询问她病情时，又以此为难伯爵：“是君所能乎？”伯爵回答：“吾识君刚二月耳。”马克立刻反唇相讥：“彼识吾仅五分钟，而钟情若此，吾所以鄙汝之戇也。”^{[5]21}使得伯爵无言以对。二个月的相识时间，并不是很长，伯爵的关心不多或不深，也并非完全说不过去，马克故意刁难，恰显现了她对伯爵的厌恶不耐。亚猛认识马克只有五分钟，倒也不是无根之谈，因为两人初次见面时，一句话都没有交谈，马克只顾吃葡萄，以轻慢的态度对待亚猛，亚猛颇觉尴尬，很快就离开了。这里使用了“五分钟”这么明确的计时刻度，较之传统所用的“片刻”、“须臾”、“刹那”等用词，更为具体确切，和“二个月”形成的对比也更为鲜明。

《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但叙述外在的事件进程，处处标记明确的时间、地点，叙述内在的心理变化，也经常藉用具体的时间刻度。例如马克与亚猛订情以后，约定“明夜十一点至十二点两刻”再次相见。亚猛一方面高兴莫名，另一方面则迫不及待：“时时视壁上悬表至一百次”，^{[5]29}这里也是使用具体的统计数字：“一百次”，以传达亚猛急切情状。接着写亚猛赴约情形：“已而钟动至十点半，余度行至马克家适十一点，遂自寓起行。”^{[5]29}亚猛想要见到马克的心情虽然急切，却

依旧遵守时间,预备准时赴约。准时与否,说来也是中西时间观不同且具有某种指标性的行动习性。不过,预计可以准时赴约的亚猛,到了马克家,守门者的回答却是:“‘姑娘出,从未有十一点前即归者。’余始谓由家至恩谈街,为时当半点钟,因阍者言,自视其表,仅五分钟,可知余情恋马克行路之迅也。”^{[5]30}由守门者“从未有十一点前即归者”一语可知,马克与亚猛约定“十一点至十二点两刻”之间相见,原来也是一个“准时”的约定。她对自己的行踪,时间上是有一定程度掌握的。这里“五分钟”再次出现,也是借用“五分钟”之短,反衬走路速度之快,用来表达亚猛心情的极度急切。从这些细节描写屡屡运用具体的时、分刻度,以传达小说人物心情的不耐、急切,或者相约的时间准确度等等,可以发现西式的时间计算方式,与中国传统小说相较,有其显著的不同风味。

亚猛与马克订情后再次相见,马克便将自己住处的钥匙给了亚猛,允许他自由进出。两人情好爱深,由此可见。接着,马克原与亚猛相约,当天夜里再会,中午时分亚猛突然接到马克短信,要求晚上暂勿前往,亚猛立刻怀疑马克是要接待其它客人。当天下午“四点钟”,亚猛便到处访寻马克踪迹,找寻不到,到了夜晚“时钟动十一点余”,亚猛即到马克住处门外守候,“迨十二点钟时,有车至九号”,亚猛亲见伯爵造访马克,竟在门外守候,伯爵“直至四点仍弗出”,亚猛伫立至天亮,然后回寓大哭。^{[5]38}这一天发生的事,主要是描绘亚猛因爱生妒,伺察马克行踪,然后失望、痛心的经过。事件进程中,不断以钟点计数说明时间的流逝,并显现亚猛心情的猜疑、失望、痛苦。当天下午四点到隔天凌晨四点,总计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内,亚猛不但行动上“进退莫知所适”,^{[5]38}心情上也是跌宕起伏。时间的明确性,让读者清楚了解这是发生在十二个小时内的变化,亚猛深陷情海的痴心,于是也明晰可辨。

小说便是在这样的叙事进程中,不断镶嵌各种长短久暂不一的年、月、日、时、分,传播西方的时间意识,且在无形中教育当时的中国读者。种种明确的时间、地点,无异展示了中西社会的不同生活习性与时空观,对于当时正在逐渐接受西方事物的中国读者而言,不但新鲜奇特,同时也是更为具体的领略途径。

亚猛与马克虽然两情相悦,用情至真且深,然而亚猛之父为了儿、女的前途,亲自拜访马克,请求马克主动离开亚猛。马克为了成全亚猛一家,不告而别,最后受屈病重而逝,亚猛因获得马克所遗日记,才知道实情始末,惜已追悔莫及。《巴黎茶花女遗事》末尾附载马克日记,既名为日记,每段开头必载记月日,自是常态。且所谓日记,乃以记述每日生活事件为旨。日记这种文体,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密切度,远较其它文体来得更强更深。学者大都认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纳入日记的写法,对于民初言情小说如《玉梨魂》有重要的启发作用。^[8-9]日记虽是中国早就存在的一种文体,然而把日记引进小说里面,《巴黎茶花女遗事》可以说是重要的引领先锋。马克遗留的日记里面,除了第一篇详述离开亚猛缘由及其后痛苦情状,篇幅不但最长,所述事件、情景也最为详尽。迨至病重以后,每日所记,主要是病痛难忍与思念亚猛之情。例如:

十二月二十日。天气极严寒,密雪纷落。余只一人楼居,病狂热三日矣,不能书一字。病中并无殊望,凭虚构想,拟得亚猛一笺,而笺终不可得。(下略)

一月四日。余在此数日中,痛苦无尽,并不知人生受病,其身乃难死如是。(下略)

二月五日。余呼曰:“亚猛来,亚猛来!我苦极死矣!”(下略)

此处藉由日记的形式,反复重述身体的病痛与情感的心痛,运用日常性的书写文体,描述重复性甚高的日常病情与心情,这部分不但道尽马克临终前的苦情,同时也在多次重复的日记内容里,让读者看到马克时时记挂亚猛的深情,及其具体化的生活与心情状态。这种“拟真式”的写实笔法,展示了日常生活与心情的重复性质,形同一再加重、加强马克的境遇,其遭遇之不幸与对待亚猛之专情、深情,透过具个人私密性质的日记,产生了更为强大的说服力。日记,这种性质上属于私人记录日常生活的文字载体,在小说的末尾,发挥了极大的艺术效用,深深感动读者。小说前大半部,主要透过亚猛第一人称的口吻,陈述他对马克的深情、误会、绝情、忏悔,小说末尾部分,透过马克遗留的日记,读者得以经由“第一手”文字,亲

见马克的心情与真情。日记在此,与亚猛的自述,有互补功能,也具有平衡效应。亚猛与马克两人的感情,各自有“第一手”文字可以检视,小说的表述于是更为圆满,也拥有更为充分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时空刻度的改变,不但影响日常生活的规划与进程,而且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整体方式,这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根本性的重大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都因此产生前所未有、且至今未已的变化。《巴黎茶花女遗事》中,确切的时空刻度与细微的心理曲折,交相呼应、烘托,乃至透过日记体的重复叙述,反复强调马克的病情与心情,这些写法,一方面藉助于凡常的生活事物达到传情写意的宗旨,另一方面也透过真情挚意,让日常微物、琐事细节产生更丰沛的艺术能量。两者相辅相成,其实是不可分割的。

四、结语

《巴黎茶花女遗事》以翻译言情小说之姿,透过琐碎细微的生活小节,形塑亚猛与马克之间情

爱的真诚深挚,也将西方社会的时空观、生活方式,如真似画的摆呈在中国读者眼前。小说中有关生活细节的点点滴滴,不但具体逼真的写出亚猛与马克之间的深情与无私的付出奉献,而且栩栩如生的摹绘出某种实际生活的日常图卷。这种日常生活图卷的鲜活逼真,加上小说风行一时的事实,无形中达到大量传播异质性的、不同于中国既往之“新生活”方式的效应。小说中的蜜渍葡萄、男女见面礼节、咳嗽、喝水,以及门牌编号、时间刻度、钟表等等,既是人物交际、传情的媒介,也是事件推进的依傍,当时的中国读者,不仅接受到“欧人之性情”,也同时接受到西方的社会习尚与生活日常,无形中增进了对西方社会与生活的认识。清末出版的林译小说多达百种有余,其大受欢迎的畅销数量,像《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样的作品,除了影响当时文坛与后出小说,也同时传达了西方社会不同于中国旧有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对于中西碰撞时期的读者大众而言,无异是接触、理解西方的重要载体之一。

参考文献:

- [1] 严复. 严复集[M]//王栻. 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1904).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 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3]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4] 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3[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5] 小仲马. 巴黎茶花女遗事[M]. 林纾,王寿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6] 曹雪芹,高鹗. 彩画本红楼梦校注[M]. 冯其庸,校. 台北:里仁书局,1984.
- [7]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全集·9[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8] 冯永玲. 从巴黎到中国:林译“茶花女”对中国现代言情小说的影响[D]. 苏州:苏州大学,2008.
- [9] 蔡祝青. 译本外的文本:清末民初中国阅读视域下的“巴黎茶花女遗事”[D]. 台湾: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2009.

(责任编辑:许秀清)